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 准军事行动新探 (1949~1969)

郭永虎 李 晔

【摘要】1949~196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从事了一系列准军事行动,其实质是为美国远东战略利益服务,目标是利用西藏分裂势力遏制与分裂中国。其具体内容包括: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情报和准军事训练技术;在西藏实施公路袭扰和破坏行动;为达赖集团提供军事物资和活动经费;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等等。

【关键词】美国中央情报局 西藏 准军事行动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5-0085-0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贯彻美国冷战期间的全球战略部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秘密活动,包括为实现遏制新中国的战略目标开展针对中国西藏地区的秘密准军事行动^①,这些行动长达20年之久。本文主要以美方解密文件为依据,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准军事行动进行一些探讨。

—

美国情报系统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首次接触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42年的亚洲战场,由于缅甸失陷,中国西南的“给养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政府决定修筑一条战时补给线:“印度—西藏—云南”公路新通道。该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②的两名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抵达拉萨。^[1]他们是美国首次派遣入藏的使者,既负责勘察公路地形任务,又从事了一次转达美国总统向达赖喇嘛致意、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官员建立联系的秘密访问。两位美国军官回国后曾建议战略情报局向西藏提供三部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赞成托尔索伊的建议,并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献策: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开端。1943年下半年,战略情报局向噶厦赠送三部无线电

【收稿日期】2005-03-30

【作者简介】郭永虎,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30012;李晔,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30024。

^① 准军事行动指介于传统军事行动与非军事之间的行动,这里主要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分裂势力的秘密援助行动。

^② 1942年6月13日,美国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合并,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1947年更名为中央情报局。

台和五部无线电接收台。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中央情报局;只要总统授权、国会同意拨款,中央情报局就有权在国外执行各种秘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在军事干涉过于强硬、外交手段软弱无力时,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便成了美国政府的第三种选择。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分裂势力的秘密援助活动就是这种准军事行动的典型表现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涉足中国西藏、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是美国亚洲总体战略中遏制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最高决策机构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西藏,西藏将会成为共产党中国向印度施加影响的基地,“因而会对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构成威胁”^[2];相反,“一个分裂的西藏”却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希望的“中国在某一方面出现内部崩溃”之目标正好吻合。在美国看来,即便无法分裂中国,西藏分裂势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国的资源,从而实现削弱中国的目的。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从强烈的反华政治需要出发,把中国西藏纳入其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各种途径与方式支持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活动。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向西康藏族地区进发,拉开了进驻西藏的序幕。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的关注着西藏局势,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有关情报。此间,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也准备以武力对抗解放军入藏。7月,达赖喇嘛的长兄当采活佛(土登诺布)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到达纽约,成为美国与达赖秘密联系的中间人。最初,美国曾试图阻止西藏和平解放,故极力怂恿达赖和西藏噶厦拒绝签订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在这一计划落空以后,也就是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噶厦签署《十七条协议》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实施了策动达赖出逃的计划。中情局通过夏格巴^①和当采活佛等向达赖喇嘛为首的噶厦做出4项承诺:(1)华盛顿将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他的120名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2)华盛顿将同意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3)华盛顿将提供经费支持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4)华盛顿将考虑提供其他军事援助。而美国承担所有这些义务的前提条件是达赖喇嘛要离开西藏,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3]但是这一计划再次落空,因为达赖喇嘛在西藏内部主张统一力量的压力下,无奈于7月23日返回拉萨。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此次密谋为1959年达赖逃往印度埋下了伏笔。

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积极支持并操纵西藏分裂势力,策划了一系列旨在制造“西藏独立”、反对新中国的分裂活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艾利逊认为,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发展到集体公开骚乱的阶段,“西藏的形势正在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进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他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决定由中央情报局在西藏实施 NSC5412 计划——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

^① 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pa),藏独分子。孜本为职称,藏语“孜”为会计财务之意,“本”为官员。1948年夏格巴曾任西藏非法出行印美英等国的商务代表团团长。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夏格巴成为达赖分裂势力在国外的代表之一。

行动计划。^[4]1954年3月1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NSC5412计划。此后，1955年3月12日、12月28日，美国总统又批准修补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这三个文件均属“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的秘密军事行动计划”。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别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下，具体由中央情报局负责领导反对和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行动”的全部间谍和反间谍行动。这项秘密行动的目标是在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和统治的地区发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帮助游击队活动，并保证那些力量在战争中的有效能力，使他们在战争中扩大军事力量获得所需的供应品。^[5]

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12/2号文件的精神，由总统、国务院和国防部指定代表组成代表团，又称“5412委员会”或“特别小组”^①，也称5412小组。该小组具体指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重大秘密行动。这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实施的各种秘密行动计划都由这个小组决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依据NSC5412计划在中国西藏地区开始了秘密援助“藏独”的行动。1954~195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夏格巴、鲁康娃、洛桑扎西在印度的噶伦堡设立了所谓“西藏国民大会”总部，以策划领导西藏地区的叛乱和分裂中国的活动。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印度靠近西藏边境的阿尔莫拉一带设立谍报网，建立了3个“教育中心台”、2个“医院”、2个“麻风病医院”和1个“肺病疗养院”。实际上，由这些机构组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基地。同时，中央情报局通过嘉乐顿珠^②在西藏扩大间谍网，把叛乱活动发展成“一场公路之战”。他们成立了所谓“护教军”、“民族自卫军”，还纠集一些凶悍的康巴人和土匪，“反叛者依靠这条山路获得所需的大部分弹药”。^[6]1955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下属机构开始在噶伦堡城郊招募西藏士兵，先后在台湾、冲绳群岛、塞班岛、关岛等地秘密进行训练，^[7]然后秘密将这些受训人员遣回西藏，作为抵抗力量的骨干。同年夏天，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康定县策划了康巴地区的叛乱，企图以康巴叛乱为前线，掩护西藏本区“驱汉独立”。在这次叛乱中，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遣游击战专家安东尼帮助西藏分裂势力组织了袭击解放军的军事暴动。在康巴叛乱失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宣传工具——“美国自由亚洲学会”资助土登诺布到美国做旅行演讲。^[6] (pp.884~885)

在1956年以前，“西藏行动”并没有单独列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局的工作部署，中央情报局也没有专门负责“西藏行动”的官员。其在西藏的秘密行动统一由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布劳负责。1956年后，布劳任命约翰·里根担任“西藏行动”的专门负责人。约翰·里根的具体职责是通过嘉乐顿珠与达赖进行联系、评估西藏抵抗的能力以及为实施“西藏行动”计划做准备活动^[8]，新负责人的设置表明了中央情报局对“西藏行动”的重视。

为了解决西藏分裂分子的训练和物资给养，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两方面的行动。一方面，实施代号为“马戏”的行动计划。1957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授权约翰·霍司金斯挑选6名西藏分裂分子秘密离开西藏。他们被送到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塞班岛接受训练，主要学习游击战和准军事行动基本技术。训练结束后，中央情报局实施代号为“ST BARNUM”的空中渗透计划——将训练的藏人向西藏内地渗透。另一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西藏分裂势力空投军事物

^① 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则称为“303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设在办公大楼303房间；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称作“40委员会”，是依据规定其活动的一个文件命名的。

^② 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次兄。他是达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联系的中间人之一，曾参与策划西藏叛乱、组建叛乱武装，鼓噪“西藏独立”。

资。1958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在藏南活动的反叛武装第一次空投给养。11月4日,一架运输机在山南哲古给叛乱分子空投武器50包;26日,又向西藏山南地区运送武器弹药226驮^[9];年底,向扎古拉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约100支美式来复枪、20挺轻机枪、2门55毫米迫击炮、60枚手榴弹,每支枪和每门炮配置300发子弹或炮弹。^[10]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上述秘密援助活动助长了西藏上层分裂集团的叛乱活动。1959年初起,西藏武装叛乱逐步升级,叛乱分子的骨干成员不仅袭击解放军,而且还对藏民进行劫掠、烧杀,强迫他们反对中央政府。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迅速平息。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便开始准备挟持达赖逃往印度。美国政府认定,“达赖的出逃符合美国的利益。”^[11]于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达赖集团由罗布林卡渡拉萨河南逃。“一路上,曾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紧紧相随,把达赖喇嘛的行程随时报告给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一行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飞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给他们空投所需物资。^{[6](p.886)}3月17日夜,达赖集团一行在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的帮助下逃到印度。

三

在1959年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乱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首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占有绝对有效的军事优势,加之其使用飞机,西藏叛军已被“成功地肢解”。^[12]其次,“西藏(叛乱)游击队总是大集团作战,军事调动过于烦冗”,他们对当地地形熟悉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12](p.762)}接着,杜勒斯分析了中国军队的困难,即,解放军数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进过程中要克服严峻的给养运输、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挑战。因此,如果破坏拉萨—北京的供应线,北京的损失就会出现“实质性地增加”。^[13]于是,中央情报局确定了一套方案:使用空降伞兵,将其空投到西藏,实施破坏西藏公路运输行动。这一计划由中央情报局在黑尔营^①专门训练的康巴人来实施,他们在学习破坏技术后被空投到西藏进行公路袭扰行动。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报局决定在康区西部的边坝地区进行公路袭扰行动。边坝位于萨尔温江南岸,与中国的“成都—拉萨”公路距离很近,由于中方在该路段南北支线控制薄弱而被选中。同月,在美国受训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边坝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控制该地区;进攻成都—拉萨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破坏军事设施,袭扰并阻断军事运输供给,以阻止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物资供应和军需运输,破坏袭扰解放军镇压叛乱的行动。为配合上述行动,中央情报局为边坝地区的叛乱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资。

1961年2月,中央情报局决定实施第二轮袭扰战,这次他们选择了西藏茫康地区。茫康位于湄公河与雅鲁藏布江之间,是西藏叛乱分子的聚居之地,也是中国内地公路穿越康区第二条线路的终点站。中央情报局准备据此破坏中方的后勤运输。3月,在科罗拉多训练的7名藏

^① 黑尔营,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10山地师总部。这个营地曾被用来训练美军的山区作战部队和特工人员。该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与西藏地形有许多相似之处,藏人训练营被称为“Dumra”(藏语“花园”的意思)。

人由中央情报局使用 C-130 运输机空投至西藏芒康地区。

事实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地区上述两次公路袭扰并不成功，也没有给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构成威胁，^[14]因为驻藏人民解放军对空降的西藏反叛分子实施了有效的围剿。中央情报局从 1957 年开始空投到西藏的 49 名藏人，只有 12 人得以存活，其中 10 人逃往印度，1 人被俘，1 人投降。到 1960 年底，西藏内部的叛乱分子已经基本被肃清。

向中国西藏腹地渗透失败后，中央情报局又开始酝酿新的“西藏计划”。1960 年前后，鉴于直接空投的结束以及驻藏人民解放军对噶伦堡以北地区的控制，实际上已使公路袭扰战不再奏效，中央情报局和西藏分裂势力决定寻求一个新的安全活动基地。由于印度不愿为其提供基地，他们将活动根据地从西藏境内转移到尼泊尔的木斯塘地区。1961 年初，中央情报局对木斯塘的藏人叛乱游击队提供援助。3 月 15 日，中央情报局从泰国起飞的飞机首次向这里的叛乱游击队空投武器、无线电操作员、装备和生活必需品。他们的任务是进攻解放军分散的营地，并在拉萨至新疆的交通干线上破坏运输。4 月 2 日，中央情报局又向木斯塘空投了 7 名黑尔营藏人学员。由于他们的袭扰迫使中国在该地区增加兵力，并使西藏西部的交通线改道为青海至新疆的公路。^[15]为了扩大武装规模，木斯塘藏人游击队的首领要求继续增加空投武器的数量。当中央情报局要求继续空投时，遭到了印度的反对。印度国防部长杜特向美国表示：“为了加强中印边境的防空，坚决击落任何侵犯印度领空的飞机，因而希望美国的飞机在将来的空投中不要飞越印度领空，也不希望美国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对中国，而使问题复杂化”。^{[15](p.248)}没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计划暂时搁浅。

四

1962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的程度和模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在对待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印度领土（领空）援助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立场和行动上，印度由原来的反对者（至少是中立者）变成了主要的积极参与者。导致印度变化的直接原因是 1962 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中印边境战争，导致了美国与印度关系的升温。美国与印度在军事上积极合作，美国答应每年为印度提供 5000~6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为期 5 年），而印度获得该项援助的条件之一是与美国合作共同遏制共产党中国。^[16]军事合作促使美印两国在情报领域展开了准军事行动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地区负责人菲兹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分别为合作双方的代表。

美国、印度在“西藏计划”中各取所需。美国的目的在于“抵抗所谓共产党中国在印度与南亚的扩张”，具体行动是通过藏人游击行动收集中国在西藏军事布置的情报；印度的目的是利用西藏叛乱分子为印度的北部边境提供防卫。1962 年 12 月，穆立克实施“察克拉塔计划”。依据该计划，这些藏人将被组建为“特别边境部队”，任务是收集中国情报和实施其他准军事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力配合“察克拉塔计划”，除了为特别边境部队提供辅助性训练如跳伞技术外，还派出 106 名美国特种部队人员提供“秘密的”游击战术和非常规战术训练。^{[8](p.181)}同时，美、印两国情报部门还将受训的藏人间谍派往西藏和中印边境实施侦察活动。他们通过跳伞进入西藏内部建立了 20 个情报站，其任务是侦察中国军队的集结动向，安装传感器用于侦察中国核试验及导弹试验，截取中国军事通讯的信息。^[17]

1963 年 11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度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联合行动机构——

“特别中心”。“特别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西藏渗透间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西藏及中印边境地区，用无线电收集并发送关于西藏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其提供持久的“Rs-1 - Rs48”型太阳能无线电电台。

在1964年1月的“特别小组”会议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制定并实施了新的“西藏行动”，包括：政治行动、宣传和准军事行动。该计划的目的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主要是印度）确立一个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并在中国内部培养抵抗共产主义政治发展的能力”。^[18]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计划”1964年度预算中为达赖集团提供173.5万美元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尼泊尔基地藏人游击队员；达赖津贴；装备、运输、设备及训练费用；科罗拉多秘密基地训练费用；将科罗拉多的藏人运至印度的空运费；其他各种费用，如装备费用和侦察组的供给、空中补给、西藏间谍网的筹备费及薪水等。^{[18] (p.732)}

同年6月初，木斯塘爆发的一起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印合作的行动模式。为寻找游击队袭击反华“素材”，一家英国电视组在帕特森的带领下未经允许来到木斯塘，说服了木斯塘藏人游击队发动了一次对中国车队的袭击。这一过程被帕特森拍摄并被曝光后，使得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暴露而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为此，中央情报局停发了对木斯塘藏人游击队的半年援助资金。由于木斯塘袭击事件的败露，美印合作的军事袭扰行动被迫转变为情报计划。^{[8] (p.199)}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两国情报部门针对中国情报的合作进程。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印度提供10架C46运输机和4架直升机，其中有1架C46运输机被改装成电子侦察机平台，这些飞机沿着喜马拉雅山飞行，收集来自西藏的中国电子通信情报。^{[8] (pp.207~208)}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使用C46运输机将木斯塘游击队运输至西藏内部的定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是执行电话窃听计划，窃听联系中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电话线，并将窃听的磁带运往印度，再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分析。^{[8] (p.277)}

五

从1967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木斯塘西藏分裂势力的援助行动开始走下坡路。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木斯塘武装力量的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没有在西藏内部实现破坏中国供给和通信系统的目标。其次，木斯塘游击队的任务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别边境部队”来完成，它得到美国和印度的长期支持。^{[8] (p.222)}1968年，中央情报局格里奇菲尔德在西藏行动的形势报告中向“303委员会”特别小组建议，“在西藏内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选择重要目标开展无线电窃听）要好得多”。^{[18] (p.739)}到1968年，约翰逊政府停止了对木斯塘西藏分裂势力的资助。^[19]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对外政策出现历史的转折。为摆脱越南战争的泥潭和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美国需要中国的参与，因而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从此，中美关系出现了趋于缓和的趋势。中美关系的解冻导致了美国西藏政策的重要变化，美国中央情报局停止了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武器供应，关闭了在尼泊尔木斯塘的训练基地。1974年，尼泊尔军队清剿了木斯塘的藏人游击队，叛乱首领旺堆等被击毙，西藏叛乱武装被彻底瓦解。

美国中央情报局援助西藏分裂势力的一系列行动，其实质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产物。美国通过西藏分裂势力进行所谓的“坚持中国战略后方的游击战争”来打击、遏制和分裂中国，以实现其亚洲冷战的总体目标。美国力图在中国境内寻找“冲突”和“叛乱”的反华力量，并企图

扶植和操纵它，使其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从实用主义出发，美国的西藏政策始终是根据冷战全局与局部战略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西藏分裂势力则成了这种政策变化的牺牲品。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援助行动助长了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使所谓“西藏问题”愈加复杂化、国际化。

[参引文献]

- [1] [美] 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01 页。
- [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缩写为“FRUS”，下同），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1949, Vol. XI, State of Tibet. p. 1072.
- [3] [加] 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4 页。
- [4] *FRUS*, 1952~1954, Vol. XIV, U.S.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p. 51~52.
- [5] NSC5412/1, NSC5412/2. 缩微胶卷：《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美国大学出版公司），第 4 卷（Start of Reel 4, *Docu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4~1977*, Microfilm,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80）。
- [6] 于力人：《中央情报局 50 年》下，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84 页。
- [7] 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 Since W .W.II*. New York: William Marrow and Company Inc., 1986, p. 159.
- [8]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Kansas :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 35.
- [9]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3~84 页。
- [10] 张植荣：《20 世纪的西藏——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0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2~313 页。
- [11] *DDR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CIA Memo for Mr. Karl G. Harr, Jr. and Mr. Bromley”, Suj: Exploitation of Tibetans. # 618 - 1997.
- [12] *FRUS*, 1958~1960, Vol. XIX,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403rd meeting of NSC, April 23, 1959.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755.
- [13] Lowell Thomas, Jr., *The silent War in Tibet*,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p. 128
- [14] *DDRS*,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s, Annex B: Military, 29, June 1962. # 13 - 4/1 - 62 (Supplement NIE), # 3010 - 1998.
- [15]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 246.
- [16] *FRUS*, 1961~1963, Vol. XIX, South Asia, No. 348, http://dosfan.lib.uic.edu/ERC/frus/summaries/960820_FRUS_XIX_1961~63.html.
- [17] Ken Conboy, *Elite Force of India and Pakistan*, Buffalo: Osprey Press, 1992, p. 27.
- [18] *FRUS*, 1964~1968, Vol. XXX, China: Question Pertaining to Tibet,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8, p. 731.
- [19] 《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秘密战》，[美]《芝加哥论坛报》1997 年 1 月 26 日，转引自中国人权研究会《美国支持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分析》，《人民日报》2001 年 5 月 26 日，第 1 版。

[责任编辑：叶张瑜]

Abstract: The number of workers and staff members increased by 1.2714 million in Shanghai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inly because more than two hundred thousand baby boomers of the 1950s joined the ranks of employed population every year. The door of units under the 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 in Shanghai was open to school graduates (as high as 72.28% of the newly employed) and demobilized soldiers, but closed to others with their status obstacles. Due to a steady growth of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m in the whole employed population in the city during this period Shanghai gradually lost its urban economic functions in finance and trade and changed from a multipurpose city into a production-type c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cropped up such as disorderly urban layout, jammed traffic and the mixture of industrial areas with residential areas that adversely affected the life of the people.

Keywords: Shanghai,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mployed population, sources of employees, composition of workers and staff member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Federati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eng Huamin(76)

Abstract: Following the breakou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general mood of transforming the “old state machine” the women’s federations at all levels were organizationally subjected to attack and even their existence was at stake.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storm to seize power by force and the general turmoil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was put under military control until the time when the new system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was introduced. The women’s federations at local leve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ere also in a state of collapse. The destruction of system of women organizations and the system drawbacks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weakened the work for women and made more obvious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federations. After 1970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changed its equivocal attitude on the women federations and gave clear instructions to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m. Then the women federations were rebuilt from the grassroots to the provincial level. However, as it was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right and the wrong on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the rebuilding of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was not accomplished.

Key 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omen’s Federation, women

A New Probe into the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CIA in Tibet of China in the Period from 1949 to 1969 Guo Yonghu & Li Ye(85)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f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this paper makes an all-round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of the Americ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in aid to the Tibetan splittist forces from 1949 to 1969. These activities were purported to serve the American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and to make use of the Tibetan splittist forces to restrain and split China. The activities centered on providing intelligence and paramilitary training skills for the Tibetan rebels, carrying out highway raids and sabotage in Tibet, supplying the Dalai clique with military materiel and funds, and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with Indian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s against China.

Keywords: the Americ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Tibet,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